



Fenxi Makesi

Shehui Hezuo Jiqi Fazhan

分析马克思

社会合作及其发展



张静◎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Fenxi Makesi

Shehui Hezuo Jiqi Fazhan

分析马克思

社会合作及其发展

张静◎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马克思:社会合作及其发展 / 张静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624-8050-1

I. ①分…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4728 号



分析马克思:社会合作及其发展

张 静 著

策划编辑:雷少波 唐启秀

责任编辑:李桂英 版式设计:唐启秀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5.75 字数:241 千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8050-1 定价:33.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本书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4 年度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NR2013074)

前言

社会合作意指在社会实践和交往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了达到共生共存、互利互赢的共同目标而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张维迎在《社会合作的制度基础》一文中说:“人类的所有进步都来自合作。……人类的合作的范围越宽、越广,人类的进步就越快。”(张维迎,2014)他认为,经济学真正研究的内容就是理性人之间如何合作。

人与人的合作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包括哲学、政治学、法学等更为广泛的领域。这个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吸引了无数思想家沉湎于此,并为之探索终身,马克思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过“社会合作”的概念,但他的著作中却有大量相关论述。他在吸收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营养因素,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论战,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中阐述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散见于马克思各个时期的著作之中的基本观点与具体论述,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与逻辑结构,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社会合作思想。

人类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哲学家们的论述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根本上说都带有各自的片面性、抽象性和非现实性。马克思认为,个人必须借助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为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通过他人和集体的力量来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广泛的社会合作。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建基于西方政治思想史,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各种要素、传统和途径的整体。它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历史与实践相统一为基本方法,全面阐述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合作的主要观点和历史嬗变过程。在这一思想创立过程中,马克思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深入考察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其以前社会产生的各种问题，吸取前人特别是同时代思想家关于社会问题的认识成果，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合作思想，奠定了马克思社会观的重要理论基础。

作为其宏大的社会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以人的社会实践以及由实践而引起的各种关系为核心，其理论视野涵盖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基于伦理道理和共同意识的文化关系、一定经济基础上的制度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合作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和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客观的经济状况、制度供给、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也包括主观的道德素养、价值追求等内在因素。由这些结构性要素以及诸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有机体的静态和动态结构，维系了社会的运行和发展。

马克思从多维度对社会合作进行探究与阐释：第一，在社会生产基础上把握社会合作的实践性。马克思颠覆了以往对合作思想的传统诠释，把“统一性”的理性世界回归到现实的社会生产。第二，从人的本质规定阐释社会合作的主体性。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的探索不应从虚幻的理性世界中寻找人类现实生活的根据，应注重从人的社会性与实践性本质规定阐明社会的合作本质。第三，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探寻社会合作的动态性。合作不仅表现为社会关系，也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模式等客观条件。第四，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探解社会合作的历史性。为寻求改变世界和探求未来社会的条件和基础，马克思提出了分别体现出三种不同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模式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角度将合作放入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来研究。第五，从整体性角度追求社会合作的全面性。第六，在“真实的集体”中发挥社会合作的优越性。马克思提出了“真实的集体”的概念，对以往“虚幻的集体”进行了揭示与分析。马克思是从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入手，从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中开展合作研究。

马克思之后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现象的考问和解释，唤起对马克思及其理论的深切关注。各种社会合作思想相继出场，围绕人类合作自然生成的外在条件、原初发生机制、社会合作的维系机制、多元化社会的合作趋势展开争论，可谓论峰迭起，纷繁复杂。今天的人类社会历史现实同马克思创立社会历史理论的时代相比，在内在结构、运行方式、发展内涵和

问题困境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景观现象、“当下即是”思维、“陌生人社会”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以唯物史观和科学辩证法为基础的社会合作的宏观解读和宏大叙事的理论研究范式已经无法涵盖当前更宽广的时代问题,这就要求自觉完善、丰富或者转换相关研究视角、研究方式和理论范式,以多样化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更加积极有效地面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历史生成	1
第一节 西方传统社会合作观:理性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抵牾	2
一、前资本主义合作思想影响及流变	2
二、资本主义合作思想影响及流变	6
第二节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社会合作观的视野分离	13
一、由幻想世界到生活世界:马克思哲学根基的视阈转换	14
二、由理性主义到唯物史观: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变革 ...	18
三、由形而上学到科学辩证法: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范式转换 ...	23
第三节 新唯物主义合作观的确立:政治理想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27
一、在社会生产基础上把握社会合作的实践性	27
二、从人的本质规定阐释社会合作的主体性	29
三、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探寻社会合作的动态性	30
四、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探解社会合作的历史性	31
五、从整体性角度追求社会合作的全面性	33
第二章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物质基础及实践维度	35
第一节 生产力维度的社会合作关系	36
一、生产力推动社会内部利益的分化与重组	36
二、生产力水平制约社会合作的发展程度	46

三、社会合作为生产力提供发展空间	54
四、生产力与社会合作的嵌入式关系	56
第二节 生产关系维度的社会合作	59
一、社会合作反映一定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关系	60
二、社会合作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协调	63
第三节 社会合作的其他经济因素	66
一、生产方式维度的社会合作	66
二、经济基础维度的社会合作	71
三、经济模式维度的社会合作	73
 第三章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精神基础及致思路径	78
第一节 社会合作的思想预设	79
一、合作精神是社会合作的思想导向	79
二、从实践的生产关系到共同体	84
第二节 社会合作精神的形成要素	92
一、社会合作的道德基础	92
二、理想信念引导下的社会合作	100
三、情感、责任与社会合作	103
四、社会合作的价值趋向	106
第三节 社会合作精神的培育路径	109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合作精神的前进方向	109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合作精神的价值形成	114
三、共产主义的最高奋斗目标激励合作精神的社会认同	117
 第四章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制度基础及其价值指向	120
第一节 异化社会的批判路径	121
一、劳动异化：异化关系的社会表象	121
二、资本逻辑：异化问题的实质根源	127
三、制度变革：异化关系改变的最终指向	133

第二节 社会合作的产生机制	138
一、社群组织的深层发生机制	139
二、社会政治制度的形成原理	141
第三节 社会合作的协调机制	145
一、社会制度的规范向度	146
二、国家制度的理性规范	147
三、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的互补性协调功能	150
四、“国家—社会”模式的思想机理	154
第四节 社会合作机制的公正原则	157
一、制度规范语境下的公正	157
二、超越虚妄与浪漫：马克思社会合作的公正原则	160
三、公正的制度设计是社会合作的理性品格	164
 第五章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人学意蕴	167
第一节 自由个性的实现：社会合作的终极关怀目标	168
一、人的语义嬗变和认知逻辑	168
二、人的自由发展：社会合作的目标	172
三、“自由人联合体”：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	175
第二节 个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社会合作程度	179
一、社会合作的历史新主体和新动力	179
二、人的生存发展依赖社会合作	182
三、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186
第三节 社会主体与社会合作的互动共生	188
一、社会合作尊重个性发展	188
二、社会合作的本质在于利益关系和谐	191
 第六章 马克思之后社会合作的思想争论与时代发展	195
第一节 马克思之后社会合作的思想争论	196
一、人类合作自然生成的外在条件	196

二、社会合作的原初发生机制	203
三、社会合作的维系机制	206
第二节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时代化与实践策略	210
一、全球化与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发展	211
二、景观现象与社会合作的新建设	213
三、“当下即是”思维引导下的社会合作	216
四、“陌生人社会”的合作关系新探索	219
五、大数据时代社会合作的意蕴趋向	224
结语	230
参考文献	232

第一章 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Karl Marx)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我们一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着自己火热的青春,有着常人都经历过的成长过程。他的思想也是如此。”(刘小枫,2007:13)马克思处于新旧要素激烈替换与相互交织的时代,在对资本主义及以前的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了一个具有别样性的新世界。在刚刚打开这个新世界大门的初期,马克思不可避免地带有旧世界的印记。正是在与旧世界的关联中,通过研究西方传统社会关系理论生成和转化的演变,寻求未来社会合作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建构了自己的社会概念与社会合作理论系统。

马克思的社会合作思想不是简单的思想重复和过程重复,而是吸纳优秀成果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正如列宁(Влади мирИльи чле нин)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列宁,1995:309)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一群体的代表,而是通过对整个人类生产与人类行为目的的客观观察,“从所有思想家的思想中提炼出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和框架,把它构造成为一个社会分析和社会革命的有力工具”(斯通普夫,2005:545-546)。

第一节 西方传统社会合作观：理性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抵牾

“社会”一词在拉丁语(sociare)中意指联合或共享。在罗马和后来的中世纪法律中与之相关的较为专业的术语是societas，既有同伴关系和友谊关系的意味，也意指自由人之间基于一致同意而订立契约的一种法律观念。(文森特,2008:121)在西方传统思想体系中，不同时代的学者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颇丰。然而，由于哲学理念及其价值观念的不同，人们对此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争论，包括现实世界与理论设计的对抗、制度安排与社会合作的逆向关系等。西方先哲们创立的社会合作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社会关系的再思考，这些争论隐含着社会合作的思想胚芽或理性元素。马克思的社会合作观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对前人思想的吸取、融合和变革。因此，要分析马克思的社会合作观，必须先了解西方社会合作思想的流变。

一、前资本主义合作思想影响及流变

(一) 城邦和谐意义的社会合作

西方传统社会合作思想的理论滥觞或许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前更早的时期，但真正确立起社会研究理论路向的是古希腊的先哲。虽然当时古希腊城邦政治组织形式各异，包括君主制、贵族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制等，但仍不得不面对当时社会和政治上的崩解，因而古希腊的先哲极力寻求能够解决文明危机的方法。在古希腊，和谐社会理念围绕“国家如何组织，在国家事务中公民相互间的关系如何”(库诺,2006:13)的问题展开，这一问题也构成了西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哲学的主题。

在古希腊，自毕达格拉斯学派起，和谐理念作为自然哲学问题便被明确提出。苏格拉底(Socrates)针对雅典城邦内部纷争不断的状况，主张建立一个公民守法、公民团结和依靠智慧治理的和谐城邦，欲将和谐哲学理念从“天上”拉回“人间”，和谐理念被有意识地引入政治领

域。循此,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以追求真理的哲学之思来营造他的理念世界,在《理想国》中从城邦内部分工的视角来描绘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企图以此为基础解释和建构理想社会模式和社会形态。面对世俗生活“混乱无序”的状态,柏拉图提出建立由卫国者、武士、生产者各司其职的社会主张。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只能由掌握了至上“理念”的“哲学王”来管理。哲学王是政治权利与哲学真知统一的化身,象征政治与哲学的融合,然而这种融合却只能在思想世界中完成。他提出,“哲学王”开始由立法者选出,此后通常是世袭的,这与斯巴达有些类似。但只要稍有历史经验的人就会发现,“哲学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斯巴达也在历史洪流中灰飞烟灭。因此,这种设想仅仅作为一种美好的理念,一种存在于观念中的城邦。在这一哲学理念的支配下,柏拉图更加迫切地想把他的“统一性”哲学推广到“公共生活”中,废除私有财产制,进而实现他的“治国”理想。这种试图建构“统一性”社会规范的思想努力带来的却是现实中无法吟唱的“神话”,其症结正是在于最初哲学道路的错置。柏拉图还试图证明理想国阶级划分的合理性。他说,当商人、辅助者、卫国者各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干涉别的阶级的工作时,整个城邦就是正义的。而这种分工及权利的不平等合法性则来源于政府有撒谎的特权,谎言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神创造了三种人:最好的用金子做成,次好的用银子做成,普通人则是用铜和铁做成。柏拉图的正义是以古希腊自然法则理论为基础的。古希腊人认为宇宙存在着命运或必然的万物法令,每个人和事物都有规定的位置与职务,甚至连宙斯也不例外。一旦突破这种正义,便会产生争斗。这种对正义的认识与近代政治学的概念相差甚远,反而与近代法律的观念更为接近。

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那里,柏拉图那种带有浓重伦理色彩的理念生活方式被求知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亚里士多德旨在通过“中庸”方式寻找一种指向至善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人自然是城邦的动物”(亚里士多德,1965:87),人必须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城邦的各种事务,个人的完善与城邦生活密不可分。他进而论述道,国由家组成,但国优于家,国与家的关系如同身体与手的关系,由此批评了柏拉图的统一性和家庭废除论。针对财产所有问题,亚里士多德主张财产应该是私有的,避免产生无谓的懒惰,但同时应该以仁爱来教导人民,从而使大部分财产用于公共目的。他特别强调了德行是幸福的源泉,德

行无须借助外在的财物，多得无用的财物反而会损害德行，只有适度的财产才能与德行结合在一起。根据德行和财产，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政府好坏的三种形式，好政府包括君主制、贵族制、立宪制（或共和制），坏政府包括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亚里士多德为何认为民主制是坏的。亚氏的民主制与近代的认识不同，他认为，当权力由贫困者掌握而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主制。他区分寡头制与民主制时说：选举行政官的办法是分寡头制的，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制的。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的大量公民组成的，不需要任何法学家帮忙，易于被情感所左右，苏格拉底便是被这样的法庭判决的。所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不满古希腊的极端民主制。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马克思社会合作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在对社会气质的理解上，柏拉图强调公共精神，因而要求取消私有财产制，颇具有共产主义的意味。但柏拉图未摆脱斯巴达的模式。他提出，卫国者被立法者选出后，便住在共同的房屋，吃共同的伙食；国家安排婚姻，批准孩子出生，个人必须服从国家。马克思继承和改造了柏拉图的公共精神，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在对人的理解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贺来，2007）。不同的是，前者未能将哲学深入到现实中去改造世界，后者将哲学的批判推进到政治生活和现实世界的革命之中，通过实践改造现实的社会政治关系。正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马克思的源头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深远。我可以揭示这样的结果：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阿伦特，2007：6）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腊晚期哲学三大派别，即伊壁鸠鲁派、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基本均倾向于通过对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地位的认识而实现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这一时期，无论是个体的向善还是共同体的发展，古希腊哲学家关注的始终是秩序与和谐。“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有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R. G. 柯林武德，1986：22）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表达为时间的、经验性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是不值得信赖的，只有那种超越时间约束的恒定不变的规定，才是真理的可靠基础。

(二) 中世纪社会合作观的理论争论

在与罗马和日耳曼传统的斗争中,基督教取得了胜利,欧洲由此进入神权统治的中世纪。其社会合作观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深刻影响,大致分为教父哲学、经院哲学两个阶段。中世纪世界与古代世界相比,具有不同形式的二元对立特征,罗素(Bertrand Russell)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对立:僧侣与世俗人、拉丁与条顿、天国与地上王国、灵魂与肉体,他认为,教皇与皇帝的对立是集中表现。事实上,关于社会合作的争论正是围绕四个对立面展开。

基督教思想的主要变更是减少了斯多葛学派和罗马世界的司法理论,并强调国家应该运用仁慈的治国方式,以作为道德的榜样。在中世纪,理性精神与信仰主义的奇特结合锻造了基督教政治哲学。由此,古典政治哲学走向一种异化,即神学政治。

早期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基督教哲学将柏拉图的思想重新以基督教方式改写,天国与地上王国主题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奥古斯丁在其中流露出对尘世君主和国家的不信任。他认为,再好的君王也不过是人,其统治必将是不完美的。只有成为上帝城邦的一员,并凭借这一超越政治领域秩序的关系,人才有可能获得公正与幸福。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的城邦消除了对公民社会的需要。奥古斯丁本意不是要上帝之城取代公民社会,而是要为它提供手段,以使它达到一个超越所有世俗利益的目的。这部著作的重要性还在于明确提出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认为要成为上帝之城,国家必须在宗教事务上服从教会。这一理论成为教会争夺统治权的依据。奥古斯丁还描述了现世和来世,在现世,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是混为一体的;只有在来世,被神所预先选定的得救者同被神厌弃者将分开。来世论让个人在教会的统一启示下开展社会合作,消解了现世的意义。

基督教会将哲学的地位置于神学以下,中世纪经院哲学主张以神法启示人法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共处。经院哲学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或许是托马斯·阿奎那(Aquinas St. Thomas),他被罗素评论为超越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对历史与近代均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阿奎纳时代,关于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争论从未停止。阿奎纳努力让教会相信亚里士多德的

体系比柏拉图更适合作为教会的哲学基础。阿奎纳利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作为经院哲学里政治哲学的部分，写就了《异教徒驳议辑要》《神学大全》。他在其中阐明了来世幸福论，认为在今生不能享受至上的幸福，但在死后便要和上帝面对面相见，并从神的法律角度论述了伦理问题。这些著作虽成为教会指定的讲义，但由于应用了理性思辨的方法，实际上形成了双重真理：基于启示的神学真理和基于理性的哲学真理，为理性、科学的新世界埋下了伏笔。

中世纪从5世纪绵亘到15世纪左右，个人对上帝的责任要高于对国家的责任。虽然社会动荡不安，然而统一神权的观念却一直延续，一切权力出自上帝，上帝把神圣权力交给了教皇，把世俗权力交给了皇帝。但千年历史已经证明，追求“统一性”与“同质性”的治国蓝图只存在于“彼岸世界”“和谐”的理念世界无法嵌入到矛盾的现实社会之中，更没有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生产方式领域，仅仅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制度预设和理论构想，与人们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实践日渐疏离。15世纪以后，法国、西班牙、英国等民族国家兴起，教皇和皇帝都丧失了重要性。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教会思想与马克思社会合作观的直接联系，但仅从历史的认识角度看，对历史过去和未来的理解方式还是有相似之处。

二、资本主义合作思想影响及流变

随着教会权威的衰落，城邦的兴起，世俗文化逐渐替代僧侣文化，民族国家成为支配社会的统治势力，催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人开始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为资本主义合作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日益发展的工业革命进一步改变了社会合作方式，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进而必然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极大地改造了社会型态，同时产生了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在资本主义这个舞台上，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不断增长，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马克思，1995：274）。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基础，从而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与此同时，各个学派关于合作思想的争论也日趋激烈，产生了“绝对理性”、经济“互补性”、“契约式”、思辨形式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多种社会合作思想。